

《水滸傳》命名的演化與章回小說以“傳”命名的傳統

李 小 龍

〈Summary〉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Shui-Hu Zhuan* is the first Romance. It's original name may be "Shui-Hu Zhuan", the source of the name because of its allusions and implicit political implication. *Shui-Hu Zhuan* in the evolu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form a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system, its naming some differences, such as the version of late Ming adding the word "loyalty", the version of synthesize used complete to excessively praise, the abbreviated version of Jing sheng tan used "the fifth genius book" as advertised. The fact that the naming of *Shui-Hu Zhuan*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anGuoYanYi*, and laid The Chinese Classical Zhanghui novel named "Zhuan (fiction)" pattern.

〈Key words〉

Shui-Hu Zhuan *Shui-Hu* name Zhuan (fiction)

相对于《三国演义》的命名来说，《水浒传》命名的演化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但其命名的影响却远比《三国演义》大得多，因为它以“传”为名其实也切合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以及史传文学影响下的文言小说命名体系，因此对后世章回小说的命名影响深远。

一、《水浒传》命名的含义

《水浒传》这一命名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反倒不会考虑它真正的含义。其实，这个名字与中国小说传统的命名方式相比有很特异的地方，即并不是用作品中的人、事来命名，却非常明显地用避重就轻的方式来命名，这自然应该有其寓意。明人袁无涯在其刊本的序中便对此名进行了解释：

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滸”名之。滸，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命名微矣。¹⁾

他首先指出这个命名是避重（“不言梁山”、“不言宋江”）就轻（“仅以‘水滸’名之”、“虚其辞也”），其次也承认这个命名是有其深意的（“罗氏之命名微矣”），但他的解释却是说这个微意是表明宋江并不敢占据梁山，只是效法姜太公避居东海之滨以俟机辅佐圣主而已。这个看法其实只是为了迁就百回本添加的“忠义”二字而已（参后文）。

与袁无涯相反，金圣叹对明末文人硬加进“忠义”二字深恶痛绝，所以他对此名又有新的解释：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滸》，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滸，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²⁾

这个说法又太过于牵强了。总之，他们都为“忠义”二字所苦，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将“水滸”的命名与“忠义”捆绑在一起，从而遮蔽了对其命名的探究。

罗尔纲先生最早指出“水滸”一词当来自于《诗经·大雅·绵》，其诗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的诗句，《毛传》解释说：“滸，水厓也。”³⁾只是，他的结论却是“取‘水滸’为书名，以表明梁山泊与宋王朝对立，建立新政权的全书内容的”⁴⁾，其实，这个结论带有浓厚的阶级分析意味，因而也并不妥贴。

此后，王利器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水滸〉释名》，也认为“水滸”之名当来自“率西水滸”之句，但却将“水滸”坐实为周原之地，“盖以史进的活动范围在关西五路，而史进又是‘真命强盗’，志在图王霸业，其发迹在周原地区，故以周家发祥之地水滸，取以为书名曰《水滸传》也。其意若曰，无论周家也好，史家也好，一例是图王霸业”⁵⁾。当然，王先生对《水滸传》的版本有其独特的看法，但这里将“水滸”理解为周原地区则稍嫌胶着。

其实，若要对此名有公允的理解，还要回到最初的出典上来。古公亶父为周文王的祖父，武王伐纣后尊其为太王。《孟子·梁惠王下》记载说：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居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⁶⁾

杜贵晨先生指出：“古公亶父之周族‘率西水滸’，与宋江等离乡井、归水泊，同是‘逼上梁山’；古公亶父之周族‘至于岐下’，建设家邦，与宋江等经营梁山，‘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同是构造自己的‘乐园’，是各自生活理想的实现；古公亶父之周族反对狄人的侵略，却臣服于商，与宋江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同是心怀忠义。种种相似，使以‘水滸’名《传》取譬古公亶父‘率西水滸’的故事，顺理成章。”⁷⁾同时也注意到《孟子》的记载中也恰恰有“踰梁山”之语，亦可助成二者间的联系。

这些相似的确都是很好的证据，但却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对《水滸传》命名的出典不斤斤于细节的讨论，而是从整体把握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周文王是儒家塑造的圣贤，

而《綿》詩不但寫古公遷到岐山開國奠基的功業，還寫了周文王能繼承古公遺烈，使周日益強大。因此，這裡以“水滸”為名就當有以下兩重含義：一、周文王在“水滸”之地發展壯大，“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⁸⁾則有“禮失求諸野”的含義，也就是李卓吾在其《忠義水滸傳序》中反復陳說的“忠義”“歸於水滸”之意。二、古公亶父“率西水滸，至於岐下”，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以“水滸”為名，也暗含着嚮往仁政的潛台詞。

二、《水滸傳》命名的演化

《水滸傳》的版本系統異常複雜，在古代小說的版本里是最難理清的，不過，不同版本系統的命名相對來說却要單純一些，我們可以分期列表對照如下⁹⁾：

(一) 文簡事繁本

序号	书名	刊刻时间与刊刻者	回数
1.	新刊京本全像描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滸全传	万历初福建建阳余氏双峰堂刊	103 ?
2.	全像水滸（残页）	万历中闽刻	?
3.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滸志传评林	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建阳余氏双峰堂刊	103
4.	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滸全传	宝翰楼刊	?
5.	郑大郁序本水滸传	万历间黎光堂刻	115
6.	汪子深序本全像水滸传	崇祯元年广东惠阳富沙刘兴我刊	115

文簡事繁本向來被認為是最複雜的一個系統，其成書究竟在被當作《水滸傳》定本的文繁事簡本之前還是之後，學術界一直以來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在《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研究》中即認為：“簡本很可能從繁本出，但不一定從現存繁本出，簡本代表的刊刻體制應當來源於時代更早的底本。”

通觀上表的六種版本，除《全像水滸》的殘頁無法確定命名外，余五種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最簡單的“水滸傳”，如黎光堂本與劉興我本均如此；另一種是“忠義水滸全傳”，如雙峰堂刊插增本及寶翰樓本，還有一種余象斗刊評林本下文再論。首先，這裡的“水滸傳”自然是最初的命名。其次，加“全傳”二字則來自明代書坊的大肆插增情節，如“征田虎、征王慶”故事的加入等等。明人張鳳翼便曾說：“刻本唯郭武定為佳，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成添足，賞音者當辨之。”¹⁰⁾馬蹄疾先生認為其文寫於萬曆十六年（1588）年左右，則其所指絕非萬曆四十二年刊行的袁無涯本，而是指上表所列的文簡事繁本。最後，命名中的“忠義”二字則很可能來自文繁事簡本。

(二) 文繁事簡本

序号	书名	刊刻时间与刊刻者	回数
1.	京本忠义传(残存)	嘉靖间刻本	?
2.	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	万历十七年安徽新安原刻, 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	100
3.	大涤余人序本忠义水浒传	新安黄诚之刻本	100
4.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万历三十八年杭州容与堂刻本	100
5.	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忠义传	万历间四知馆本	100
6.	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	天启间积庆堂藏版	100
7.	忠义水浒传	康熙中芥子园刊	100

上表列出文繁事簡本七种, 除第一种“京本忠义传”残缺外, 余五种命名均为“忠义水浒传”或“水浒忠义传”, 可见被视为《水浒传》版本演化过程中定本的文繁事簡百回本在命名上相当一致, 都有“忠义”二字。事实上, 就是“京本忠义传”也有此二字, 马蹄疾先生在著录此本时说:“版心上端标目《京本忠义传》, 当为书名之略称。”¹¹⁾也就是说, 其这里所用的名目其实出自残页的版心, 而我们知道, 一般来说, 版心的题名多为略称, 此或为“京本忠义水浒传”的省略¹²⁾。

那么, “忠义”二字的添加从何而来呢? 最早的天都外臣序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忠义”二字, 但其云:“夷考当时, 上有秕政, 下有菜色。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 壅蔽主聪, 操弄神器, 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 厌厌不振, 以就夷虜之手。”¹³⁾已经将水浒好汉被逼上梁山之事归罪于奸臣挡道了。接下来大涤余人的序则明确提出“自忠义之说, 而人文俱乱矣。……亦知《水浒》惟招安为心, 而名始传, 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 而书始传, 其言忠义也。”¹⁴⁾当然, 其最著者则为李卓吾的名文《忠义水浒传序》, 他提出“《水浒传》者, 发愤之所作也”, 并继承天都外臣序的意思, 说:“盖自宋室不兢, 冠履倒施, 大贤处下, 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 中原处下。一时君相, 犹然处堂燕雀, 纳币称臣, 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然而再进一步发挥:“施、罗二公, 身在元, 心在宋; 虽生元日, 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 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 愤南渡之苟安, 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 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 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 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¹⁵⁾从这几则序便可看出, 《水浒传》之名前加“忠义”二字, 实为明末汪道昆¹⁶⁾、大涤余人、李贽等文人相沿而来者。

当然, 汪道昆等人为《水浒传》涂抹上“忠义”的色彩也有其原因。首先, 水浒故事本身便有忠义的成分, 《水浒传》与“说铁骑”之伎艺有密切联系¹⁷⁾, 而“说铁骑”又与南宋抗金时兴起的“忠义军”有关。其次则源于面临内交处困的现实, 明末文人以名节、忠义相砥砺的思潮。

(三) 繁简综合本

序号	书名	刊刻时间与刊刻者	回数
1.	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	万历四十二年安徽袁无涯刊	120
2.	绣像藏板水浒四传全书	崇祯初郁郁堂梓行	120
3.	忠义水浒全书	崇祯间宝翰楼刊	120
4.	初刻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	崇祯间广东熊飞雄飞馆刻	110
5.	绣像汉宋奇书忠义水浒传	清末金陵兴贤堂梓行	115
6.	英雄谱本忠义水浒传	文元堂刻	115
7.	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	德聚堂重印文星堂梓行	115
8.	陈枚序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	乾隆元年序刻	124

繁简综合本比较复杂，因为这种本子往往同时具有前两种版本系统的特征，因此，其命名也大致上可分为两种形态。上表八种版本中（其实不止八种，但有很多种命名完全相同，便省略未录），有五种加了“全”字，这当然是繁简综合本最大的特征，即以“全”来标榜，其实最典型的便是袁无涯刻本，正如它内封所题书名一样，叫作“水浒四传全书”，就是在文繁事简本基础上再加征二寇从而凑成征四寇的全书罢了。而陈枚序本叫作“五才子书水浒全传”，这显然是繁简综合本与腰斩断刻本杂凑而成者。至于其余三种大多属于与《三国演义》合刻的“汉宋奇书”本或“英雄谱”本，这一系统的命名与文繁事简本同，均为“忠义水浒传”，事实上这几种本子都有征田虎与征王庆的情节，则其并非来自文繁事简本甚明，那么，这一系统的版本则当借鉴了文繁事简本的命名。而最后的陈枚序本则更是综合了后来的腰斩断刻本与繁简综合本，因此，其题名即有“五才子书”这样表明为金圣叹腰斩本的名目，却也有“水浒全传”这样标榜更全的广告语，当然，也有着《水浒传》版本中最多的一百二十四回的回数。

(四) 腰斩断刻本

序号	书名	刊刻时间与刊刻者	回数
1.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崇祯十四年贯华堂刊	70
2.	王仕云评论五才子水浒传	顺治十四年醉耕堂刊	70
3.	句曲外史序绣像第五才子书	雍正间光霁堂刊怀德堂藏版	70
4.	王韬序本图绘五才子奇书	光绪十四年上海大同书局石印	70
5.	绘图增像句曲外史序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	清末铜版	70
6.	句曲外史序本绘图第五才子奇书	上海书局石印	70
7.	句曲外史序本绘图评释第五才子书水浒	敦玠好斋用泰西法重石印	70
8.	句曲外史序本绘图评注五才子水浒传	章福记石印	70
9.	第五才子书水浒全传	宣统三年上海静瑶书局石印	70

10.	王仕云評精校全圖足本綉像水滸傳演義	民國間廣興書局鉛印本	70
11.	句曲外史序本改良彩像五才子演義	民國間上海文盛書局石印	70
12.	新式標點水滸	民國九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	70

腰斬斷刻本其實是金聖嘆的自我作古，但其命名也出現了新的現象，所以亦可討論。

金聖嘆有所謂才子書的提法，他把《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及《西廂》合稱為“六才子書”，其實，金聖嘆並沒有明确提出排序，但在這個名單里，《水滸傳》排在第五，於是便成了“第五才子書”¹⁸⁾。這當然並非命名，只是一種廣告語，所以最早的金評本貫華堂本便將這幾個字放在題目前作為修飾。然而到了光霽堂刊句曲外史序本，則將“水滸傳”三字提到作者一欄里，書名處只留下“第五才子書”五字，於是，從文獻著錄的角度看，這一版本的書名就變成了“第五才子書”。

有趣的是，以上十二種版本中，有“才子書”字樣的共十種，但其中有五種卻只署為“五才子書”，把“第”字去掉了——這其實是有問題的。金聖嘆的“第×才子書”使用了序數詞，看似在評定作品，其實是評定作者，“才子”是指稱作者的；清初產生了才子佳人小說的“開創之作和典範之作”《玉嬌梨》與《平山冷燕》¹⁹⁾，這兩種書便將“第”字去掉，一名為“三才子書”，一名為“四才子書”，合刻為“七才子書”：前者指蘇友白、白紅玉、盧夢梨三人，後者指平如衡、山黛、冷絳雪、燕白頷四人。這樣，“才子”由作者而變為主人公，“才子書”也就變成了“才子佳人小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水滸傳》改稱為“五才子書”是講不通的，因為書中並無可以例舉的五位才子，書也並非才子佳人小說——清初，才子佳人小說大行其道，《水滸傳》命名中的這一小變化或許便是受到這個潮流的影響。

至於“五才子奇書”這樣的書名，則又是才子書與“四大奇書”系統的雜糅——其實，這種雜糅在《三國演義》的命名中體現得更為充分，毛評本命名為“四大奇書第一種”，後來“奇書體”還是敵不過“才子書”，於是後世版本都演變成了“第一才子書”²⁰⁾。

除以上所論之外，上表中還有“五才子書演義”、“水滸傳演義”及亞東版新式標點本幾個命名，則置於下文討論。

縮結而言，《水滸傳》命名的演化並不像其版本系統那樣複雜，通過梳理大致上可以看出，最早版本雖然已無法看到，但可以推測其命名正是“水滸傳”；而加“全”字則大可不必，因為這已要確定為後人增補者；當然，若以百回文繁事簡本為《水滸傳》的最後寫定本的話，那麼，則當以“忠義水滸傳”為定名。然而，現在學術界與普通閱讀界都將以容與堂本為代表的百回繁本視為定本，來加以研究與閱讀，但卻徑以“水滸傳”三字名之，恐怕並不符合此書命名的真實情況。

三、《水滸傳》異名辨析

雖然就《水滸傳》本身而言，其命名的演化並不複雜，但附着在其命名之上的，還有一些異名，尚需辨析。

（一）宋江演義

明人郎瑛《七修類稿》中有《三國宋江演義》一條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于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于二書之事尤多。據此，見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編成之耳。”²¹⁾王利器先生據此推論云：“則在嘉靖時人所見之本又有《宋江演義》之名，竊疑此本即梁山泊系統本也。”²²⁾其後，陳松柏先生也認為“《宋江演義》是連接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與《水滸傳》必不可少之鏈條”²³⁾。

也就是說，在王、陳二先生看來，歷史上存在過一種名為《宋江演義》的水滸故事版本。這種提法源於郎瑛的記載，而郎氏記載只是泛泛提及，古人在行文中提及書名尤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書名，向來比較隨意，並不嚴格，有時喜歡以局部代替整體，這裡不過是以主人公之名代指其書而已，據此以為郎瑛看到過《宋江演義》之書，或以其為水滸故事三大系統之一，或以其為水滸故事必不可少之中間形態，都似乎有些膠着了。

（二）宋元春秋

明末人劉子壯在其《杞思堂文集》中有《宋元春秋序》一文：

《水滸》，傳也，曷以謂《宋元春秋》？曰：志宋之將為元也。自古國家崇賄賂而不修廉節者，必有民患；尚虛名而不治實業者，必有國禍。……及至宋末，此二患者兼而有之。王安石以財困天下，童、蔡相緣，肥家瘠國、溝壑內憤，強鄰外咄，卒成有元。以施、胡（羅）二公之才，幽辱塞漠，進不得為岳、韓，退不得為晁、宋，托諸《水滸》，發其孤憤，其所由來漸矣。……施、羅二公身居人國，不敢直言，而托之往代；不忍直言討童、蔡四賊，而托之河北、江南，蓋亦猶《春秋》之義云爾。……此余所以謂《宋元春秋》也夫。²⁴⁾

此文將《水滸傳》以“宋元春秋”名之。然遍檢文獻，未發現有所謂《宋元春秋》的版本，所以這個名字也不能作為《水滸傳》流傳過程中實際使用過的名字。當然，劉子壯這個改名的想法亦有其用意，即將《水滸傳》當作是政治影射的作品，這其實與“水滸”一詞所暗含意義有相同之處。

（三）英雄譜與漢宋奇書

與前兩條相比，此二條則有所不同：一方面，此二條書名的確都是《水滸傳》命名演變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名字，現在還有相當多的版本存世；另一方面，這兩個名字却都並非《水滸傳》一部作品的專名，而是與《三國演義》一起的合稱。

這種合刻的形式其實來源於晚明的通俗類書，以《國色天香》、《綉谷春容》為代表的通俗類書是適應急劇擴大的世俗閱讀市場而興起的一種粗糙讀物，極為流行，“懸之五都之市，日不給用”²⁵⁾，其內容均極駁雜，一般分為上下兩欄，詩文、詞曲、小說、軼事，莫不備載，這都是消遣性讀物的最大特徵。書坊主也敏銳地發現了這種形式市場前景，便將當時最流行的兩部長篇章回小說以此形

式合刻，但以惯例合刻后需要一个总的书名，就如《国色天香》之类一样，于是最初便以“英雄谱”为名。杨明琅《叙英雄谱》说：“此谱一出而遂使两书英雄之士，不同时不同地而同谱，则寒烟凉月，凄风苦雨之下，焉必无英雄豪杰之士之相与慷慨悲歌，以共吐其牢骚不平之气耶！而又安在非不得已中之一快哉！故为君者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英雄在君侧矣；为相者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英雄在朝廷矣；经略掌勤王之师，马部主犁庭之役，又不可以不读此谱，一读此谱，则干城腹心，尽属英雄。”²⁶⁾虽然最后的排比句显然是抄自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序》，但对此名由来解释的还算清楚。

而“汉宋奇书”则更为明确分别代表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个命名的灵感或许来自“奇书”体系。不过，仔细考察此类版本，会发现它们都在书口处题“汉宋奇书”四字，但在鱼尾下则又题“英雄谱”三字，也就是说，这个名字仍是“英雄谱”体系中的一部分。

四、《水浒传》命名对《三国演义》的继承与对后世章回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向来并称，其创作时间的先后也一直没有办法清楚地界定，不过，二者却似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倒不是上文所提及的后世书坊将此二书合刊的事例，而是他们的作者，学术界基本上可承认《水浒传》的作者中也当有罗贯中²⁷⁾。

虽然如此，但此二书的世界却如此不同，所以除作者外好像也没什么联系了。不过，《水浒传》的书名却的确当受到过《三国演义》的影响。

(一) 水浒传

前面在讨论《水浒传》命名意义时，一直在讨论前两个字，却并未论及“传”字，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把“传”字当作文体概念，这个概念是有相当久远的来历。中国小说接受史官文化的影响非常大，而史家从《史记》开始，叙事之言多在“传”中，因此，后世的文言小说便也多以“传”字为名，尤以“有意为小说”的唐传奇更是如此。不过，章回小说与文言小说并非一个叙事体系中的文体，自然并不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那么，《水浒传》的“传”字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自然不排除有史传文学与文言小说的远源，但近因则应该来自《三国演义》。后者在明代出现了大量以“三国志传”为名的早期版本，目前在世最早的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行的叶逢春本，这也是现存章回小说里除张尚德本《三国演义》外唯一早至嘉靖年间的版本。这一版本系统的命名便是在《三国演义》的蓝本《三国志》后再加一个“传”字而来的，这一方面是袭自经部典籍的注疏体例中的传体；另一方面又非常巧妙地袭用了史书的体例²⁸⁾。因此，《水浒传》最后定名便沿袭了这一体制，在《三国演义》的命名最终倾向于“演义”二字而抛弃“传”字后，《水浒传》便成为了“传”体章回小说的开山者。

（二）水滸志傳

《三国志傳》系统的版本对《水浒传》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找到更有趣的证据，那就是在《水浒传》的版本系统中，也出现了《水滸志傳評林》这样的名字。而这一版本恰恰是刊刻了《三国志傳評林》的余象斗所刻，更可确证，这个名字来源于《三国志傳》。

不过，这个命名其实是来源于误解，所以很不通，因为本来就没有“水滸志”这样一本书，又何来为此“志”而作的“傳”呢？事实上，余象斗是把“志傳”合起来当作文体的名称了，因而仿“三国志傳”的例子编造出“水滸志傳”这样的名字来。所以，“志傳”这个名字在《三国演义》的版本系统中蔚为大国，但在《水浒传》的版本系统中却仅此一家，而且后世再未出现过后继者。

由上两类影响来看，《水浒传》的产生与流行的确当在《三国演义》之后。

（三）水浒传演义、五才子演义

“演义”一词是讲史小说的标志，经过《三国演义》的经典化之后，它已经成为讲史章回小说的文体指称。而《水浒传》显然与讲史并非一个系统，所以，它的命名不可以使用“演义”二字。

然而，到了晚清与民国间，由于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文体突然被提高，小说的阅读也十分蓬勃，所以各书坊大量出版小说作品，为补稿源之不足，便不惜将古典作品改头换面出版以牟利。其中，民国间广兴书局铅印了《王仕云评精校全图足本绣像水浒传演义》、上海文盛书局石印了《句曲外史序本改良彩像五才子演义》。前者直接在原名“水浒传”后加“演义”二字——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也有，其郑以祜本便名为《三国志傳演义》；后者则把原名全部剔除，只以“五才子演义”称之，这个名字便与传统的《水浒传》命名拉开了距离。另外，民国间上海广文书局还出版过江荫香改写重编的《水浒传演义》四卷一百八十节²⁹。由此可见，“演义”体在开创之初便是讲史类作品的标识，然而因为讲史所面对的对象有限，所以“演义”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不敌“傳”体作品，但到了民国时期，“演义”二字逐渐从讲史的标识转变为小说的代称。

（四）《水浒传》对章回小说以“傳”命名的影响

《水浒传》的命名虽然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但论及对后世章回小说命名的影响，《三国演义》却已经远远比不上它了。

据笔者统计，明代的章回小说共有八十六种，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早期典范作品来命名的数量如下：以“演义”命名的有十八种，以“记”命名的有十种，而以“傳”命名的则达到四十六种，占总数的一半还多，远远超过“演义”体与“记”体³⁰。

不仅如此，在《西游记》的版本系统中，还有《西游记傳》这样杂糅的标目，与上文提及的《水滸志傳》一样，出于误解而产生的这个名字可以明显看出在《西游记》版本系统中受到《水浒传》命名影响的痕迹。而且，入清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反唐演义傳》和《蓮子瓶演义傳》这样的题目，这也是“傳”体对“演义”体的整合，也就是说，把“傳”字附在后边，使得原本“演义”二字所含的文体意味消失。

当然，入清以后，踵武“水浒传”以“傳”命名的作品数量有一百零六种，仍然位居第一，但

不可忽视的是，其重要性也在慢慢下降，而以“记”为名的作品数量却激增到六十三种。这一倾向不只在后世的章回小说中出现，就是在《水浒传》的版本系统中也有表现，民国九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的同汪原放标点的版本便名为“水浒”，把“传”字删去了，而且汪氏也并未作任何说明——其实，汪氏标点此书极为认真，每次再版都会尽量修改前一版留下的疏误，甚至不惜重排，但却无缘无故地把“水浒传”变成了“水浒”而不作任何说明³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小说界革命以后对传统小说体制不自觉的反拨。

总之，《水浒传》的命名在其发展演化的历史上相对来说较为单纯，从最初到现在，都是以“水浒传”三字为名的。而这三字却有些奇特，因为如前所言，“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但“浒”这个字却很不用，作者最初选用此字，其实便有其隐含的寓意。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初看甚为简单，但仔细考虑却有其深意。这也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外文翻译本在翻译书名时最为尴尬的地方。就西方语言来说，大部分译名都不得不放弃直译而改用意译，比如最常用的便是“强盗与士兵”，或者意译加直译为“水边的强盗”、“水边的叛逆者”，很少有人翻译成“水边的故事”³²⁾，因为这样译出便与原作叙事风格大相径庭了。唐德刚先生曾为此拟译名为 *The Waterfront Guys*，并解释说“*Waterfront*（水浒）原来也是西方江湖豪杰聚止之地。*Guy* 虽然是俚语，却有‘光棍’、‘泼皮’之意。”而且，他对此译名颇为自得，不过，正如他攻击 *Water Margin* 这个译名的理由一样，就是他的新译也“把《水浒传》的‘传’字译漏了”³³⁾。

注

- 1) 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第132页。
- 2) 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第211页。
- 3) 参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510页。
- 4) 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页。
- 5) 王利器《耐雪堂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45页。
- 6)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163-165页。
- 7) 杜贵晨《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251页。
- 8)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559页。
- 9) 本表题名均据马蹄疾先生所编《水浒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然小有调整。
- 10) 张凤翼《水浒传序》，《处实堂集·续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74页。按：此文《水浒书录》全文收录（第55-56页），然误为“处世堂集”，且误为“续集卷六十四”；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第170页）及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1465页）亦误为“卷六十四”。
- 11) 马蹄疾《水浒书录》第50页。
- 12) 杜贵晨先生《〈水浒传〉的作者、书名、主旨与宋江》一文（《南都学坛》2008年第1期）认为“甚至还发现一个很早版本的残页，题做‘忠义传’，连‘水浒’这两个字也没有，表明《水浒传》最早不叫‘水浒’，而直接惟一的就是‘忠义’，即‘传’写‘忠义’的。”恐怕并不符合古代文献刊刻书名的规律。
- 13) 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第168页。

- 14) 朱一玄《水滸傳資料彙編》第 200 頁。
- 15) 朱一玄《水滸傳資料彙編》第 171 頁。
- 16) 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云：“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139 頁）知此天都外臣實為汪道昆化名。
- 17) 參見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第 69-71 頁；李舜華《“說鐵騎兒”與興起時的章回小說》，《明清小說研究》2008 年第 4 期。
- 18) 關於才子書提法的來龍去脈，請參見拙著《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研究》第四章第二節“才子書：逞才之目及其對敘事性的偏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19) 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第 508 頁。
- 20) 參見拙文《〈三國演義〉命名的演變》，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第 80 輯。
- 21) 郎瑛《七修類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第 246-247 頁。
- 22) 王利器《耐雪堂集》第 49 頁。
- 23) 參陳松柏《〈宋江演義〉是連接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與〈水滸傳〉必不可少的鏈條》一文，《明清小說研究》2008 年第 1 期。
- 24) 劉子壯《岷思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集部第 21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8，第 786-787 頁。
- 25) 謝友可《刻公余勝覽國色天香序》，俞為民校點《綉谷春容》（含《國色天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第 1450 頁。
- 26) 朱一玄《水滸傳資料彙編》第 205 頁。
- 27) 影響極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水滸傳》即同署施、羅二人之名。
- 28) 參見拙文《〈三國演義〉命名的演變》，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第 80 輯。
- 29) 馬蹄疾《水滸書錄》第 379 頁。
- 30) 參見拙著《中國古典小說回目研究》附錄一《中國古典小說回目情況一覽表》。
- 31) 參見汪原放標點《水滸》，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
- 32) 關於譯名的情況，請參見王麗娜《中國古典小說戏曲名著在國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第 60-71 頁。
- 33) 參見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一冊第 409 頁。

參考文獻

- 朱一玄《水滸傳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2。
- 羅爾綱《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王利器《耐雪堂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杜貴晨《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 馬蹄疾編《水滸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張鳳翼《處實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 杜貴晨《〈水滸傳〉的作者、書名、主旨與宋江》，《南都學壇》2008 年第 1 期。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 李舜华《“说铁骑儿”与兴起时的章回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4期。
- 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 李小龙《〈三国演义〉命名的演变》，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第80辑。
- 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陈松柏《〈宋江演义〉是连接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与〈水浒传〉必不可少的链条》，《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
- 刘子壮《杞思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8。
- 俞为民校点《绣谷春容》（含《国色天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汪原放标点《水浒》，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 * * *

- * 本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CZW041）、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